

中國教會的女兒——

韓國天主教慶祝開教二百周年

蘇主榮著
游麗清譯

偉哉利瑪竇！你洞開了東方傳教的大門，讓李夔和金大健也能步武你的芳踪！

一九八四年，普世教會的注意力，將由利瑪竇來華四百周年的慶典轉移到韓國教會身上。自一七八四年天主教由中國傳入韓國開始，迄今已有二百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將親赴南韓參與盛典，並主持金大健及一百零二位韓國和西方傳教士殉道者列入真福品及聖品之儀式。與此同時，韓國教會亦將向教宗呈遞申請書，希望將另外二十二位「韓國教會的開山祖師」列入真福品。這些被提名列品的教友，比中國和西方傳教士更早在韓國開教，幾乎全部都成了殉道烈士。（註一）

當時的韓國也如同利瑪竇時代的中國，士大夫是最先接受天主教信仰的人。然而兩個教會不同的地方是：福音傳入中國主要是靠外國傳教士，而韓國之開教則靠本地教友；他們不僅施教、付洗，而且彼此鼓勵，為維護信仰而殉道。

耶穌基督固然是教會的唯一創立者，但差不多世界各地的教會，對於那些由聖神指引去把信仰種籽植根於當地土壤的教會始創者，都給予非常崇高的欽敬。例如在中國有利瑪竇，在韓國則有李夔（一七五四至一七八五年）。李夔的聖名是約翰洗者；就如他



的主保聖人一樣，他亦為許多人預備了道路。

有關韓國教友傳教活動的起源，有很多不同的記載。這裏，我們只能選取部分重要資料，加以簡略說明。首先要說的是李夔。李夔對所能獲得的天主教中文書籍，無所不讀，其中包括利瑪竇的著作，尤其是利氏於一六〇三年寫成的「天主實義」。他的曾祖父李慶尙曾於一六三七年至一六四五年間，在北京給景仁助的兒子講學，而李夔的一些

書籍便是從他的曾祖父那裏得來的。此外，湯若望神父亦曾教過他一些道理，他將許多在當時仍未曾被禁止的天主教書籍帶返韓國。李夔一方面研讀這些書籍，另一方面亦是研經組學者群中的活躍份子。雖然這些學者那時尚未領洗，但已跟隨書本的指示，開始一種宗教團體的生活，定時祈禱、守齋、行善工等。

李夔被公認為這群學者中的領袖。由於群中一名成員李承薰於一七八三年隨同他的父親李東旭出使北京，李夔請求他多帶些書籍回來。根據當時某些文件記載，李夔會對承薰說：「你的北京之行，是天主賞給我們學習宗教道理的好機會。這些侍奉至高造物主及成聖之道，在歐洲已發展至高峰。沒有這些道理，我們既不能更新精神，亦不能改善品格。沒有它，我們又怎能知道諸王及其民族的不同律法？沒有它，我們的生活便失去重心。沒有它，我們便不能了解世界的創造、天上地下的一切法律、宇宙的常規、以及善惡的分別；我們也不能了解世界的來源和它的目的、靈魂與肉身的結合、善惡的問題；我們甚至不能明白基督降生成人、為人贖罪的奧蹟、以及永生永罰的含義。」（註二）由於承薰當時對教義的理解比不上李夔，他遂要求看一些李夔曾經讀過的中文書。看完之後，他便答應幫忙李夔。李夔曾這樣對他說：「你有機會到北京去，其實是韓國人民得救的神聖徵兆。當你抵達北京後，應立即到聖堂去請教神父有關教理的問題，學習彌撒禮儀，並把需要的書本帶給我們。這是一件相當重要的任務，有關韓國人民的永生的事情就交托在你的手裏。你去吧，但千萬要明智謹慎。」（註三）

這些早期的教友領袖被稱為「光明之子

」，因為他們爲了自己的啓蒙而首先學習道理，他們希望更多了解天主賜給他們的信仰，然後再與別人分享。他們似乎沒有把天主教視爲舶來品，也不介意誰會與他們分享這信仰。他們明白，天主會藉着某些人作爲媒介，而這些媒介可以在中國接觸得到。事實上，德國籍的湯若望神父就是如此奇妙地，藉着教授李夔的祖天主教道理，而間接地影响了李夔。除此之外，他們又讀意大利人利瑪竇及其他人所著的書籍；他們歡迎葡籍的北京主教所派遣給他們的首位中國神父；其後，又得法國和其他傳教士之助，建立了本地教會。

承薰在北京北堂學道理，并在那裏接受 GRAMMONT 神父的洗禮，取名伯多祿，因爲施洗的神父希望他像伯多祿一樣，成爲韓國教會的基石。（註四）鑑於他在早期韓國教會所扮演的未來角色，我們不妨想像一下，GRAMMONT 神父也許會對他說：「伯多祿，我爲你祈禱，使你的信仰堅定，好能堅固你的弟兄。」（註五）

一七八四年，李夔返回韓國，同時携回了一些宗教書籍，包括七件聖事、教理問答、聖經註釋、聖人傳記和祈禱手冊等。李夔便開始與他的學者們一起研讀，並向人講解。由此可見，利瑪竇及外方傳教士的中文著作被帶回韓國後所起的作用，是如何的重大。雖然韓國文字與中文很不相同，但韓國天主教的詞彙，如天主、聖母、聖事、教宗等，都與中文毫無差別。李夔讀過這些書之後說：「天主教的教義實在是奧妙的真理。偉大的天主憐憫韓國人民，願意我們參與救贖人靈的工作。這是神聖的使命，我們不該對此聖召充耳不聞。我們必需向人民宣講福音，使天主教義遍及全國。」（註六）

那時候，李承薰是知識界中唯一的天主教徒，其後他給李夔及其他知識界人士施洗，一起默默耕耘。據記載，承薰自北京返國後，第一年便有四千多人接受他的洗禮，而他們中大多數從未認識過一位神父。還有一名受洗者，名為權一身，是學者群中的翹楚，選聖方濟各沙勿略作他的主保，因他已決定投身傳教事業。

然而，他們怎樣贏取這樣多的信眾呢？原來，李夔在跟儒家學者辯論的時候，經常有好奇的旁聽者圍觀，人群中很多因而領了洗。為他寫傳記的一位作者說，在與李家煥的三天公開辯論結束時，這位貴介公子口服心服地說：「基督信仰的確博大真確，可是却帶給它的信徒痛苦和不幸，我們該怎樣辦？」（註七）

想不到他的話竟成了預言，就在承薰由北京返國的第一年，即一七八五年，也正是這一小撮教民開始展開傳教活動之時，首次宗教迫害就發生了。政府大施壓力，逼迫這些貴介子弟背教。這些貴家子弟一方面為了引致家庭和非信徒的親友受苦而感到抱歉，另一方面，他們的傳教心火却日益熾烈，甚至欣然殉道。至於李夔，他也受到家人的嚴厲反對，他的父親更以自殺來脅迫他背教。李夔恐怕自己那位德高望重的父親，果真一旦自殺，更會引起人們認為天主教不足信，無可奈何之下，決定退隱，以祈禱和懺悔渡其餘生。也許，正因為他離棄家人，在淡泊與嚴峻的刻苦中寂然逝去，致使他未被提名，與其他的殉道兄弟同列聖品。事實上，他的為人甚為可敬，何況當時只有兩個選擇，一是背教，一是就義；而李夔則在未有機會做這兩個選擇之前，便於一七八五年逝世。

雖然教會遭受到嚴重迫害，且痛失其創立者，但它仍然繼續成長。從教會史的角度來看，我們更好說，並非「雖然」而是「由於」有這些迫害以及受迫害而殉道的信徒，所以教會得以成長。

除了李承薰由於間歇出使中國而有機會與傳教士接觸外，李夔及其他同伴的信仰知識都來自書本，因此，他們對教會的聖統制並不了解。他們曾經自行選陞神父和主教，但當他們在這方面的認識加深時，他們便懷疑自己的做法是否有效，於是求教於中國教會，請求代為澄清。據說使節團曾費了三個月時間、徒步一千二百公里、往返二十多次，終於至一七九〇年才獲得北京湯士選主教的回音。湯主教讚賞他們的熱誠，准許他們繼續施行洗禮，但不允許他們開彌撒、聽告解、授聖職、和祭祖。（註八）他同時派遣了一名中國籍神父周文謨到韓國去。（註九）而當時的韓國基督徒在談及「北京主教」時，也和今天的天主教徒談到當今「羅馬教宗」一樣，沒什麼異樣的感覺，雖然他們都是歐洲人。昔日的韓國教友要求北京主教為他們派遣司鐸，就如今日的信眾請求教宗帮忙一樣，沒有感到很大的困難。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早期韓國教友殉道，部份原因是由於他們跟從一位北京外籍主教的指示，不舉行祭祖之禮。對韓國政府來說，這便成了政治性問題，因為韓國是

**복음의 빛을 찾아 모이는
배달겨레의 물결!**
**Koreans embrace
the Light of the Gospel!**

一個奉行儒家思想的國家，有自己嚴肅的禮規和社會體制。不遵守這些家族禮規，就等於危及國家的基礎。因此，當漢城官長知道基督徒焚燒祖先牌位的時候，便宣判他們死刑。在歷史上，我們也看過很多類似的情況出現，這可能不算是一項宗教迫害，而只能算是對信仰所帶來的某些行動加以壓制，以致基督徒被視作背叛社會習俗及儒家道統的人物。也許有人說，宗教迫害之產生，是由於那些憎恨神或憎恨宗教者的所為。其實，這不是必然的，假如信仰變成純屬個人的事，不要求「在社會中去實踐」，則宗教信仰對社會必不致造成威脅，相信亦可被當權者容忍了。

周文謨神父初到韓國即惹上麻煩。政府發現他秘密入境而下令緝捕他。但韓國教友愛他並珍惜他的牧職，竟甘願冒生命危險來保護他。崔仁吉喬裝他、代他坐牢，及至身份敗露，被打死也不肯透露周神父的行踪。由於他的英勇行爲，使周神父得以多執行牧職五年。周神父最後於一七九五年殉道。（註十）

隨後三十年，韓國教友在沒有神職人員的領導下，仍然默默堅守着自己的信仰。就我們所知，他們曾分別於一八一一年及一八二七年呈請教宗，要求為他們派遣司鐸。我們手頭就有一份致教宗庇護七世的特函副本，日期為一八一一年十二月九日。當教宗接到這封信後，相信他必定會對他們所受到的政治和宗教迫害非常了解，因為，他自己也曾經是拿破崙的階下囚，被禁於法國的 FON-TAINEBLEAU，該函的部份譯文如下：

我們熱切盼望、並懇求聖座憐憫我們……我們生活在細小的國度

새남터 성지에서
한국 최초의 방인주교 노기남 대주교의 미사 봉헌



信眾在范世亨主教殉道的聖地上祈禱。

裏……十年來飽受痛苦折磨……很多人因年老及疾病死去，而我們這些尚生存的人，不知何日方能接受到信仰的指示。我們渴求這恩寵，就如久渴思水、久旱求雨的人一般。……我們自知宗教知識淺薄，只知守齋和祈禱。的確，我們實不

配稱爲基督徒。然而，我們已有一萬多人認識天主，却還沒有獲得主教之帶領。倘若閣下的援助延遲一天，我們便要受苦多一整天；若延遲兩天，我們便要受苦多兩天。如果我們看不到從歐洲而來的救援之航，則基督往訓萬民、並爲天下人付洗的訓誨，以及福音中關於愛他人和熱切救靈的比喻，亦將成爲沒有用的老生常談。……因此，我們懇求聖座原有我們不厭之請求。我們所受的迫害，使我們不得不把這信寫在絲絹上，好使攜帶者能把它藏在衣服內。（註十一）

如此又過了很久。直至一八三一年，教宗額我略十六世才派遣巴黎外方傳教會到韓國去，並建立了第一個教區，從此脫離北京教區的管轄。那時，韓國已有四萬名天主教徒，他們之認識信仰差不多全是在俗教友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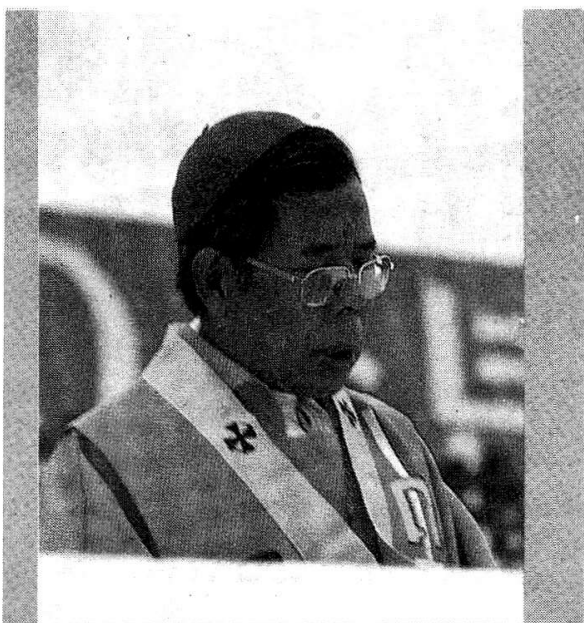
袖的功勞。（註十二）

當法國神父和主教到達韓國後，便立即依照傳教教會的理想模式，着手建立本地教會。一八三六年，他們派了金大健、崔良舉、和崔方濟，到澳門的修院接受培育。崔方濟還未晉鐸，便於一八三九年逝世；而金大健則於一八四五年在上海由高主教（JEAN FERRÉOL）祝聖他晉鐸，成爲第一位本地神職人員，一年後殉道，他的名字在列品聖人名單中居於首位。而崔良舉則是第二位韓國本地神職。（註十三）

韓國的初期教會史，實在充滿血淚，但殉道的種子却發育得更加蓬勃茁壯。一八六六年，大迫害發生的時候，教會約有二萬三千名教友。其實，早在一八三一年，便已有四萬名教友，只不過很多在一八三九年的迫害中死去而已。此外，據記載，從一八六六年至一八七三年，太子顯宗退位其間，這二萬三千名教友中便有超過三分之一被殺。顯宗於一八九八年逝世，而顯宗之妻閔妃則於一八九六年由MUTEL 主教爲她施洗；臨終前，她還懇求MUTEL 主教爲她的丈夫施洗。主教爲遂其臨終意願，乃上書請求覲見，而顯宗則以禮物和書函回覆，可是在尚未召見主教之前，便與世長辭。（註十四）倘若該邀請之於顯宗會如對於掃祿一般強勁有力，顯宗也許已變成另一個保祿，他的名字亦會躋身於列品者的名單上了。

一九四二年，教宗庇護十二世委任盧基南爲漢城主教，成爲第一位韓國主教，使韓國教會更顯本地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和一九五〇年至五三年間的韓戰，使韓國損失慘重，但教會的力量却有增無已。今日，韓國總人口一千四百萬，在南韓就有一百七十萬天主教徒。十八位



김수환 추기경
Stephen Cardinal Kim, Seoul Archdiocese

主教中有十五位是韓國人，有一千零五十九位韓國神父，二百二十四位外籍神父，三千五百一十四位韓國修女，一百五十位外國修女，一百六十位韓國修士和四十位外國修士。（註十五）

今日不少人問到：什麼才是真正的宗教自由？究竟信徒受迫害是由於堅守宗教信仰抑或是由於他們的行爲被視作相反當權者的政策和目的？真正的宗教迫害是否存在？對於這些問題，韓國教徒在信仰上所受到的如此真實的試煉，已給了回答。回顧韓國二百年來基督信仰的傳教情況，我們不妨把他們

的經驗比喻爲一支插在生日餅上永不熄滅的特製臘燭。雖然不斷有外力要把它吹熄，而火焰亦似乎是消失了，但當吹燭者稍作歇息，火焰又再重現，且比前更光更亮。隨着歲月的流轉，生日餅上的臘燭亦愈插愈多；同樣，當信仰團體每年慶祝它的生辰時，臘燭一年比一年增加，燭光亦一年比一年明亮，因而團體的慶祝氣氛更形歡樂，世界也更形光亮。就像韓國教會一樣，這些生命的作證比千千萬萬傳教士用口頭宣道，更爲有力。天主的道與人的道畢竟是不同的。

（附註見本刊頁八十三。）

